

古錢新探

朱活著

朱
活
著

古
宙
新
探

齐
鲁
书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2329

972329

古 钱 新 探

朱 活 著

*

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6开本 20.25印张 5插页 293千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1206·30 定价 4.00 元

值得研究的我国古代钱币(代前言)

研究古代钱币叫古钱学，它和考古学的其他部门一样，能够为历史科学服务。

古钱学是以古代钱币作为研究对象的，从钱币的形制、币材、金相、文字及出土时间、地点和数量，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进而探求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商品交换关系，以及货币发生发展的规律。在阶级社会里，“货币是向一切劳动者征收贡物的凭据”。因此，研究古代钱币，不仅需要放到当时的经济领域中进行考察，而且要放到当时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领域之内进行考察。

我国古代钱币的遗存是丰富多采的。就币材来说：不仅有金、银、铜、铁、锡、铅，近世又用铝和镍。先秦曾使用海贝、石贝、骨贝，珠、玉、龟壳也曾是货币行列中的成员。

就币形来说：有齐、燕刀化(刀削状)，周及三晋布钱(农铲状)，秦的圜钱(璧环状)，楚的蚁鼻钱(贝状)，以上都是青铜铸币。此外，楚的版状“郢爰”和饼状“陈爰”(陈爰也有版瓦状者)，这些黄金币已在一定重量的黄金铸块上打满了说明地方和重量单位的印记，这是我国最早的黄金铸币。

从秦行半两钱到清末，这两千多年间所流通的主要铜铸币基本上就是形圆孔方的铜钱。这种铜钱(或铁钱)非常繁杂，不仅大小不一，轻重悬殊，币材有异，同时数量也惊人。又如新莽复古，曾铸大小泉及刀布，他还有一个包括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的“宝货制度”。南宋铸有长形的铜铸牌。而历代金银饼锭，或长或短，或方或圆，形式分量，各有差异。

再就钱的文字书法来说：有真、草、行、隶、篆，太平天国钱文又用简笔字。不仅保存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古文字，并且存有著名书法家的手迹，如：欧阳询的八分书(开元通宝)，宋徽宗的瘦金体(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党怀英的玉箸篆(泰和重宝)；特别是保存了辽、西夏、满、蒙、突厥、回纥、吐蕃、女真、苗等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字，这是更值得我们珍视的。我国古钱文字能够较系统的反映了我国文字演变的历史。至于近代钱币又曾用外国文字，这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我国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烙印。

再就中国古代钱币的流通和影响来说，形圆孔方式的铜钱，不仅影响大陆上的许多民族，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突厥、回纥、西夏等，而且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国。中国汉代的五铢钱，唐代的开元钱，宋代的太平、天圣诸品，明代的洪武、永乐钱，曾分别在印度的马八儿、波斯湾的西拉夫、非洲东岸的索马利和赞

泽巴岛，以及南美洲的墨西哥和秘鲁都发现过。据说埃及也曾发现中国古代钱币。近年来在爪哇井里明洋岸山麓挖出了明代洪武通宝、永乐通宝钱币八百八十二枚。这些珍贵的资料，确实有助于研究我国古代各民族的经济关系及对外的友好往来。至于中国的纸币，后世遗存的尚有公元十一世纪北宋“交子”的钞板，南宋的“行在会子”，这在世界的纸币遗存里，要算资格最老的。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学说，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产物，有怎样的商品交换就有怎样的货币。商品交换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货币发展的过程，所以从货币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出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同时，货币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便成为掠夺、压榨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因此货币稳定与否，也很大程度地反映出当时的政治情况。

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由于它们的式样不同，大小不同，文字不同，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当时经济和政治都有很大的割据性。我们再从不同的国家或城市的铸币往往在同一地点出土，又可以了解当时经济关系逐渐趋向于统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同及历代王朝的更换，货币也是一再变换。

秦统一币制，废除了贝、刀、布、圜钱而铸行半两钱，币形上的统一，也反映秦帝国政权的统一。汉初行榆荚钱，吕后行八铢钱，文帝行四钱，武帝行三铢、四铢钱（钱文除三铢外均为半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废半两行五铢钱，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设上林三官，专铸钱，后二年（公元前113年）又“悉禁郡国毋铸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钱币基本上得到了统一；同时在钱法上也稳定了一个时期。这正说明汉代中央封建经济得到相对的发展，中央政权进一步巩固。而新莽的货制混乱，说明其改制的倒行逆施和经济上的崩溃，政权的危殆。东汉复行五铢，三国兴大钱，隋有五铢白钱，唐则主要铸行开元通宝，而乾封、乾元、大历、建中则铸量不多或甚少。五代钱法极乱，正反映藩镇割据局面的续演。宋行宋元通宝，此后多铸年号钱，如太平、淳化、至道、咸平等。南宋亦然，而铁钱特盛。辽、金、元也多铸行年号钱，明初有大中（非年号）、洪武大小诸品，自永乐以后，除几个皇帝外，都铸有自己的年号钱。清初有满文汉文大小钱，入关后，每代皇帝都铸钱，咸丰时铸大钱极乱，这又反映当时清朝政府财政的困窘，政权的动荡。

自从官家独揽铸币的特权以后，发行货币就成为官家赚钱的门路，碰上政权动摇时，便不负责任的铸造劣币。如汉末董卓毁五铢钱，更铸无文小钱，于是货轻物重，一斛谷子要用钱数百万，六朝官钱铸造马虎，盗铸也特多，有“耒子”、“荇叶”、“鸡目”、“鹅眼”之号，千钱不盈三寸，入水不沉，手捏即碎，结果米价上涨，死人无算。历代统治者在财政困难时，总以大量铸钱，实施通货膨胀作为解决财源的主要办法，这正说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货币总是成为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

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的铸币和纸币的遗存里，又能看出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经济政治的黑暗与腐朽。

大体说来，我国钱币的发生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经济，特别是

商品经济发生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政权兴衰更迭的过程。

关于古钱的研究，在我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的前辈，用谱录学的办法来整理这部分丰富多采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宝贵的劳动成果。《隋书·经籍志》就录有南朝顾烜撰《钱谱》一卷。顾谱又常引刘氏《钱志》。唐代封演、张台，宋代陶岳、李孝美诸家都有著录，可惜他们的著作如今仅存目而无书。惟南宋洪遵《泉志》十五卷，罗泌《路史·论币所起》，流传至今。清乾、嘉以前，古钱家多宗洪、罗之说，名家如丘浚、胡我琨、徐象梅等。乾、嘉以后，古钱的收藏日富，著录日精，如梁诗正等撰《钦定钱录》，陆广岑《续泉志》，张端木《钱录》，万子昭《古金录》，金忠淳《古钱录》，方嵩年《钱录》，宋振普及其子庆凝《续泉志》，张崇懿《泉志新编》，马昂《货布文字考》，倪模《古今泉略》，刘燕庭《古钱苑》，翁宜泉《古泉汇考》，钱同人《古泉著述考》，瞿木夫《古泉补正》，戴熙《古钱丛话》，吕尧仙《运甓轩泉谱》，鲍子年《观古阁泉说》，沈宝麐《泉宝所见录》，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李竹朋《古泉汇》，李竹朋、鲍子年《续泉汇》。其中《货布文字考》、《吉金所见录》、《古泉汇》，仍不失为考证古钱必要的参考书。近人丁福保的《古钱大辞典》及《历代古钱图说》，是研究古钱极有帮助的谱录和工具书。其他如冯云鹏、云鹓《金石索》有钱录，刘体智《善斋吉金录》有泉录，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收录了先秦两汉等钱范，邓实所辑《簠斋吉金录》录有铜钱范六十三，铁范一。这些资料对研究古钱也极为有用。总之，关于我国古钱的研究和整理，我们的前辈已经支付了相当的劳动，留下颇为丰富的成果，再加上考古发掘又提供了大批的实物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的条件下，把古钱这门科学研究建立起来，这不仅可能，而且也大有必要。（该文曾刊于一九五七年《文物参考资料》第十二期，今删繁就简，以代前言）

* * * *

这本论文集，多半是从笔者早年的习作中选出的，有几篇是近年撰写的。兹删其重复，纠其谬误，汇编成册，命其名曰《古钱新探》。

作 者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
于济水之南

目 录

值得研究的我国古代钱币(代前言)

古币探源

- 试论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 1

商代铜贝

- 再谈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墓出土的三件铜贝 14

布钱新探

- 空首布钱的分类及有关问题 20

布钱续探

- 平首布钱的分类及有关问题 51

试谈齐币

- 谈济南出土的齐币兼论春秋战国时期有关齐国铸币的几个问题 100

再谈齐币

- 从山东出土的齐币看齐国的商业和交通 114

三谈齐币

- 谈山东海阳出土的齐国刀化兼论齐国铸币工艺及齐刀的购买力 120

匱币管窥

- 略谈匱国货币的几个有关问题 142

匱币续窥

- 谈山东临淄齐故城出土的尖首刀化兼论有关尖首刀化的几个问题 172

蚁鼻新解

- 兼谈楚国地方性的布钱——“施钱当新” 192

蚁鼻续解

- 谈山东省曲阜县董大城村出土的楚国蚁鼻钱兼论鲁国的货币经济 211

郢爰新探

- 试论春秋战国时期有关楚国黄金货币的几个问题 217

楚金再探

- 记一九七〇年以来楚金的新发现并对楚金几个问题的再探讨 245

秦钱考略

- 兼论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措施和作用 263

汉钱初探

- 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货币275

汉钱续探

- 两汉五铢钱断代282

莽钱考辨

- “金匱国宝直万”及“新币十一铢”均非莽钱309

后 记313

再 记315

古 币 探 源

——试论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教导我们要“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①

研究我国古代钱币也不能例外，这篇文章就是遵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教导，对我国货币起源问题作一次尝试性的探讨。

我国的古代史籍，如《管子》、《史记》、《盐铁论》、《汉书》、《说文》、《通典》、《通志》、《通考》、《路史》，均有关于货币起源的叙述和记载。

《管子·国蓄》篇：“先王……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又《山权数》篇：“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赍民之无檀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赍民之无檀卖子者”。在《地数》、《揆度》、《轻重甲》、《轻重丁》、《轻重戊》诸篇中，也不乏有关货币的记载。

《史记·平准书》：“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

如果我们用出土实物来印证《管子》和《史记》上的话，显然误以周、秦之衣冠，绘虞、夏之图象，难以置信。至于《汉书·食货志》、《通典》、《通志》、《通考》所述中国货币的起源问题，多半是辗转抄袭，并无新义。罗泌《路史》论到我国货币的起源，把先秦的金属铸币认为有“葛天、轩辕、尊卢之币”^②更是臆测之词。只有汉桓宽、许慎的论断比较可取，桓氏说：“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③许氏更进一步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④但桓、许二氏之说仍然缺乏科学的论证。

关于我国货币起源及金属铸币出现的时间，文献实不尽足征；可是，我们根据货币发生与发展的规律，结合史籍和地下发掘的实物，还是可以进行探索的。

马克思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是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⑤

马克思又在《资本论》里对于货币的发生作出这样的科学论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的产物。……交换之历史的扩大与加深，又发展了在商品性质中睡眠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为便于交易，把这种对立外部地表现出来的需要，要求有一个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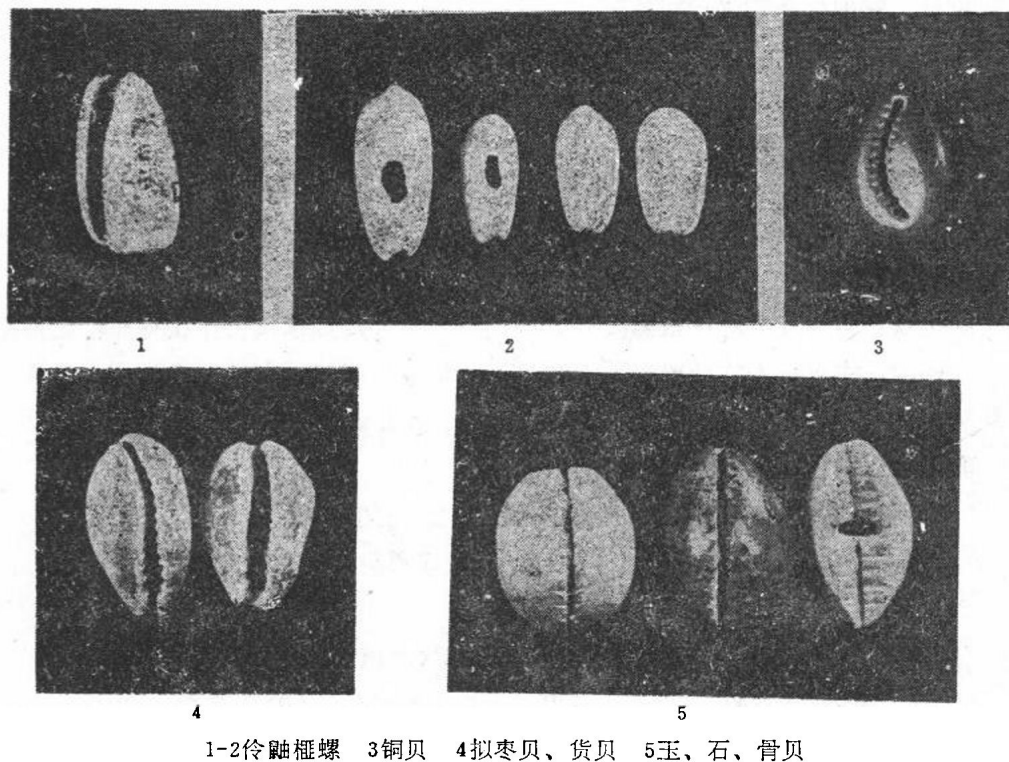
立的商品价值形态，并不绝地进行，后来才由商品分化为商品与货币的过程，最后地把它取得。劳动生产物越是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就依比例越是完成。”^⑧据马克思的分析，货币是一种在交换过程中因必要而形成的一种结晶。由于交换历史的扩大与加深，就必然要求有某种商品变成其他商品的等价物，以便于交易，最后终于使某种商品从一般商品中分化出来取得了货币形态，也就是说，货币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从一般的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特殊商品。

有哪些东西首先取得了货币形态呢？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情况下结果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种必然的趋势，马克思说：“有二种事情有决定性的影响。货币形态或是附着于最重要的外来的交换品，那在事实上就是内部各种生产物的交换价值之自然发生的现象形态。或是附着于家畜一样的使用对象，那是内部各种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要素”^⑨

依据马克思的货币起源的理论，来考察我国古代货币的发生和发展的情况，也恰恰如此。贝这种外来的交换品（玉也有可能），起码在夏、商两朝已经取得了货币形态；另一种是社会内部生产的可以转让的有用的东西——生产工具钱（或镗）和刀，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也曾先后取得了货币形态。

货币既然是交换过程中因必要而形成的一种结晶，那么交换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交换最初是带有偶然性的，但由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游牧部落和农业部落的分工，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由于这次分工，农人和牧人都需要他们在他们部落内部不能获得的物品，因而引起了交换的发展。“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也译为私有财产——引者）的时候，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货币用了”。^⑩传说我国商族三世祖“相土作乘马”，七世祖“王亥作服牛。”^⑪这个时期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大约公元前二〇五〇年——公元前一五八〇年。此从唐兰氏说）的初期，起码我们的祖先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畜牧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其实，早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的猪头骨，就是象征私有财富，表明猪这种牲畜已成为一种主要的私有财产，在交换中它就必然逐渐成为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的一般等价物，猪就成为原始货币的币材。马克思说：“货币形态最先是在游牧民族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切他们的所有物，都是在动产的形态上，都是在直接可以让渡的形态上；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断使他们与其他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生产物的交换。”^⑫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又发现非本地地产所制成的精致石斧和其他装饰品，贝这种来自南方的交换品，早在彩陶遗址中就有发现（如山西芮城礼教村彩陶遗址）。我国古代文献中又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经·系辞》）的记载，这种记载是形象地描绘了氏族公社间进行交换的情况。“但物品一经在对外生活上成为商品，它就会有反应作用，以致在对内生活上也成为商品。”^⑬汉桓宽说：“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⑭这就

是说我国从夏代起，贝就起了货币作用。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肯定其完全正确，但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从一般的商品中“选出一种贵重的商品，而其余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一商品来表现。”^⑬由于这种商品经常与他种商品交换，经过“不绝的进行”才最后完成它的转化过程，这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岁月。



1-2伶鼬榧螺 3铜贝 4拟枣贝、货贝 5玉、石、骨贝

贝这种重要的外来交换品，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曾充作货币，是没有疑问的，它是我国最古的钱币，并且行使的时间很长，秦始皇统一中国改革币制时才“废贝（应该包括天然贝和铜贝——作者）行钱”，但是在中国南部的云南地区，贝一直沿用到清朝初年。^⑭至于它在什么时候完成了转化过程，而取得了货币的资格，是有过争论的。笔者认为起码经过夏代到商代，贝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货币了。

首先，由于近年来安阳小屯殷墟、郑州二里岗等地的发掘，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商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商代后期不仅青铜器的铸造很发达，其他方面如建筑工程、交通工具、纺织、酿酒等手工业制品，也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技术水平和相当的数量。这让我们觉察出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分工，即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到了商代后期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不仅如此，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人阶级的出现，也已经很显著。商族本是以善于经商而载入史册的，“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从徐中舒氏说），这有一定的道理。商灭亡以后，周公也曾允许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⑮所以贝在当时成为重要的货币是有社会经济基础的。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商代的文献里来考察这个问题。《尚书》、甲骨文、金文都有关于贝的记载。

《尚书·盘庚》：“兹予有乱（鬲）政同位，具乃贝玉”。孔传说：“乱，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母，不念尽忠，但念贝玉而已，言其贪”。也就是说盘庚谴责贵族臣僚贪图贝玉而不忠诚，盘庚在最后告诫他们“无总于货宝”。这里看出贝已经为人所贪，又成为“货宝”，它的经济意义已很明显。

甲骨卜辞中有囚贝、锡贝、取贝的，记载如：

“戊申卜，□贞：[大]有其[囚]贝。”（《殷墟书契前编》5、10、4）

“贞土方□贝。”（同上 5、10、2）

“庚戌[下]，□贞：易（锡）多女有贝朋。”（《殷墟书契后编》2、8、5）

“丁亥卜，光取贝二朋在正月。取。”（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田野考古学报》第一册）

既把获得贝这件事看成很重要的大事，契于卜辞，如果仅仅作获得一种装饰品来理解是不够的，由于商人在迁殷以前就视贝为“货宝”，商代已有较繁盛的商业行为，所以这些贝字有的应当视为“货宝”的代称来解释，才比较妥当。

商代金文里也不乏赏贝、锡贝的记载。

“侯易中贝三朋，用乍（作）祖癸宝鼎”（中鼎铭文）。

“丁卯，王命俎子迺西方于省，唯反，王赏戌甬贝二朋，用乍父乙□”（戌甬鼎铭文）。

“癸巳，王易小臣邑贝十朋，用乍母癸鬲彝”（小臣邑鬲铭文）

“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廛（夔）贝”。（廛尊铭文，《山东金文集存》中，曾毅公系此器于商纣辛之十五年。亦有人系于商帝乙）

从这些铭文里我们可以了解，臣子有了功勋，商王赏赐他们贝而“用作鼎彝”，显然已可以充作一般等价物。

如果这些文献还不足以说明贝在当时的经济意义，我们还可以从商代遗址及古墓中贝的出土情况来考察。

殷墟出土的贝是有相当数量的，一九二八年第一次挖掘，出土九十六件贝；一九三二年在E一八一一方井中出土一六三件小贝和两件大贝；《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中说：“在发掘的一六五座殷墓中，出贝的竟达八十三座墓，共得贝二三四件，他们的位置，绝大部分是在人骨架的口中、手内和脚下三处，分散他处的很少……这些都是天然的，仅在背上的一端琢孔一个”。报告里又说在车马坑中出土的贝“约有五十余枚（整体取回，未分开数），在舆中偏西。贝形与附近殷墓出土的相同。”^⑩这种口含贝、手握贝、脚置贝、舆载贝的现象，和上述文献相参证，也许更能说明贝是一种财富，是一种和任何物品都能交换的货币，而不是装饰品。我国各地发现曾充当货币的贝类，有货贝〔*Monetaria moneta* (Linnaeus)〕、环纹货贝〔*Monetaria annulus* (Linnaeus)〕、拟枣贝

[*Erronea errones*(Linnaeus)]及大型的阿文绶贝 [*Mauritia arabica* (Linnaeus)] 等。此外, 伶鼬榧螺 (*Oliva mustelina* Lamarck) 也被充作货币, 殷墟多有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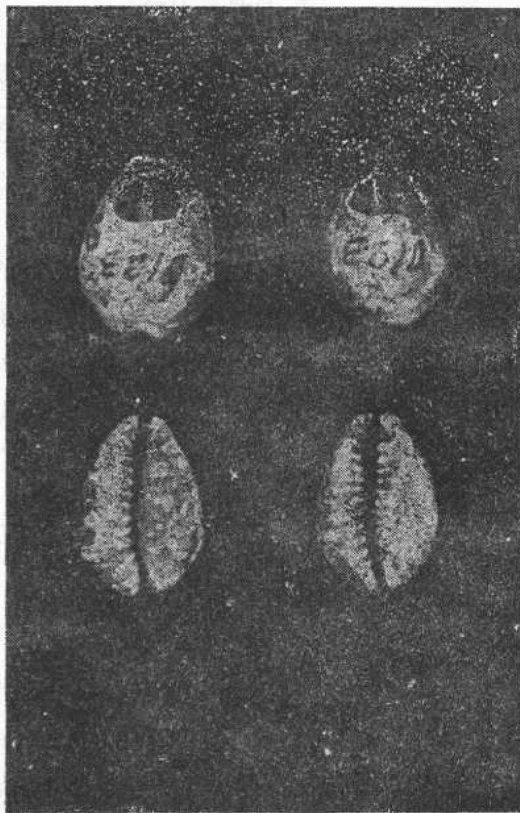
其实, 贝在盘庚迁殷以前早就是货币了。

在郑州和辉县, 属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墓葬中都曾发现过贝, 而且在郑州白家庄发掘的一座商代前期 (盘庚迁殷以前, 大约相当于仲丁迁隰到河亶甲迁相的中间。如果把商代划为早中晚三期, 即相当于商代中期) 的墓葬内, 竟发现了有穿孔的贝六百零二件之多。^①

近年来考古发掘固然还没有正式提供关于夏代社会分工的直接材料, 但是在河北平山、邯郸、河南、安阳、新乡、郑州、偃师、济阳、伊川所发现的属于商代先王时期 (由契到示癸) 的文化遗址中, 据说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商族社会牧畜业和农业的分工。农业已经上升到主导地位, 并且已跟手工业开始分工, 产生了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如果这个记录和观察不错的话, 商代先王时期基本上相当于夏代。其实一九五八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在郑州上街发掘的“上街文化遗址”, 一九五九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偃师二里头发掘的“二里头遗址 (第四层)” 如果把它们看作相当于夏代的文化也是很有道理的。^② 在上面遗址的出土物中就有骨贝、石贝。骨贝、石贝是仿贝, 说明真贝在夏代早已存在, 否则无从仿起。所以把贝开始取得货币形态推到夏代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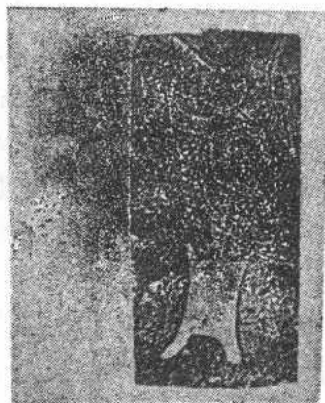
前面已经谈及起码在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 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分工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 商业活动已经很显著, 交换突破了地方市场的范围, 因此就要求起货币作用的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马克思说: “商品交换越是打破地方的限制, 商品价值越是发展成为人类劳动一般的体化物, 货币就越是归到那种天然最适于担任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机能的物品, 那就是贵金属。”^③ 在商代后期, 金属铸造的贝币也已经出现。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三件铜铸的贝壳, 发掘报告中说: “铜贝三件, 墓十四出土一件, 二件出自墓三一二, 型式相同, 系仿海贝铸制的, 墓十四的一件长一·五、最宽一·二厘米, 墓三一二的一件, 大小相同, 长一·七、最宽一·三厘米”。这三枚铜贝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因为它是摹仿贝化 (货) 的形状, 并且铜贝到西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蚁鼻钱便是有铭文的铜贝, 事实上铜贝是我国先秦铜质铸币的四大系统之一。

商代后期不仅出现铜铸贝币, 青铜铸的农业生产工具钱或铸在黄河中游某些地区也已出现, 而这种农具也曾起着交换的媒介作用。一九五二年洛阳商代墓葬中曾发现过一把铜铲;^④ 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也出土一把铜铲。这些铜铲的形状和后来在这个地区所出现的空首布钱差不多, 这种农具应叫钱或铸 (初, 钱、铸应为同物而异名, 区别不显)。武王克商曾“发鹿台之钱, 散钜桥之粟” (《太平御览》引《周书》, 《吕氏春秋·慎大览》, 《淮南子·主术训》和《道应训》, 《史记·殷本纪》、《齐太公世家》和《留侯世家》) 所载略同, 唯《周本纪》“钱”易作“财”。《说文》: “钱, 铈也, 古者田器”。段注: “云古田器者, 古谓之钱, 今则但谓之铈、谓之铈”。^⑤ 这些史料真实性如何, 目前我们还无法断定, 如果用来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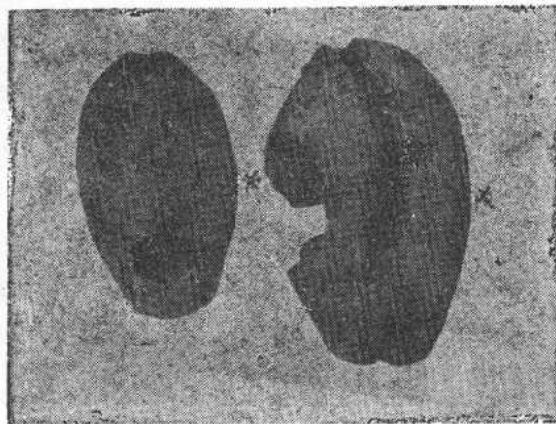
货 贝

河南省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前期墓出土



商子罍簋铭文拓本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阿文绶贝

一九五三年河南省安阳市大司空村商墓出土

证商、周之际，钱是社会内部生产的一种有用的东西，为人所熟悉的一种财富，在交换中也曾被充作媒介物，还是有益的。何况西周青铜彝器铭文里确实有“贝”“布”并举的例子。震盂：“隹十又九年，王才（在）斥。王姜令（命）作册震安尸白（夷伯）。尸白宾（宾）震贝布。……用乍文考癸宝罍器”（乍册震盂铭文）郭沫若氏定震盂为成王时器，可见周初钱、罍（布）有其经济意义是无容怀疑的。

我们对于商代货币的情况可以试得出这样一种推论。贝在夏代已经完成了向货币转化的过程，也是商代的重要货币之一。后期以铜铸造货币已经成为事实，表现在铜贝的出现和铜铸钱、罍的充作货币的某种职能。

在周代，货币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西周二百五十七年中，商业逐步在发展，到了西周末年，商人的力量已经比较显著，从公元前八四一年起西周出现了十四年的“共和行政”，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认为是当时周京百工商人反抗暴政举行起义的结果（从范文澜氏说）。我们再根据《左传·昭公十六年》的记载来看，子产答复晋韩宣子说：“昔我先

君桓公（郑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彊（强）贾，毋或勾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可见西周末年郑国商人也有相当社会力量，我们从周代前期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来考察，贝化（天然贝和铜铸贝）和块状金属等都是当时重要的货币，在三晋、三川地区还出现了原始布钱。

《易经》：“六二，震来厉，亿丧贝”，（《易经·震六二》）

《诗经》：“既见君子，锡我百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西周金文中也有不少的锡贝、赏贝、宾贝、用贝的记载。

“公易旅贝十朋，旅用乍父鬲彝”（旅鼎铭文）

“唯成王大辶，在宗周，商（赏）猷侯鬲贝。用乍丁侯鬲彝。天鼃”（猷侯鼎铭文）

“王令孟宁登白，宾贝”（孟爵铭文）。宾者，赠也。侯伯奉敬上之使者曰“宾”。

“遽伯冢乍宝彝，用贝十朋又 三（四）朋”（遽伯冢卣铭文）。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这类记载很多，而且锡贝的数目大有增加，商器最多为十朋、二十朋，而周器周公东征鼎则有“……贝百朋，用乍尊鼎”^②的铭文。我们从遽伯冢卣的铭文来观察，作宝彝用掉十四朋贝，可见贝是货币无疑。

周代墓葬也常常出土天然贝和金属铸贝。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濬县西周卫墓群中出土数共达三四七二件，这批贝多半贯穿着和殉葬品放在一起，这样大的数量不可能仅是装饰品，而应是当作财货来殉葬的。笔者在洛阳及西安见到近年来西周墓出土的大批天然贝，在沔西一座西周墓的车马坑中，发现了贝饰马络头，上面排满了贝壳，这和以黄金饰马有同等经济意义。有的确系用作装饰品，但并不排斥它们是当时的货币。关于无文铜贝，过去罗振玉谓：“磁州得铜制之贝，无文字”；^③丁福保谓无文铜贝出土于郑州；^④解放前在河南辉县琉璃阁一座周墓中曾出土成堆的达一千多件的包金铜贝。^⑤

周器铭文中“易贝卅孚”（穉卣）。一般贝以朋计。而孚为金属计重，则此所锡之贝应指金属铸贝无疑。这些材料，都证明在周代天然贝和金属铸贝是当时的重要货币之一，并且比商代后期的情况有所发展。

在周代，金属货币愈来愈显得重要。青铜彝器不乏锡若干孚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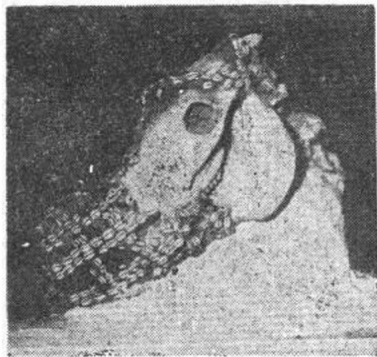
“白懋父迺罚得夏古三百孚”，（师旅鼎铭文）

“王吏小臣守吏于夷，宾马两、金十钩”，（守罍铭文）

“王锡金百孚，禽用乍宝彝”，（禽罍铭文）

“取 鬲 卅孚”，（毛公鼎铭文）

“崙兹五夫，用百孚……”，（留鼎铭文）



贝饰马络头

陕西省沔西张家湾西周车马坑出土

从上列诸器铭文来观察,大致西周时,铜(赤金)是以块状或饼状并以“孚”“钩”为单位的称量货币,铜贝也是以“孚”为单位计重使用。此外以铜铸造的工具钱、铸,在三川、三晋农业地区也正向货币转化,后世出土一种如农具(农铲)又如货币(布钱)的原始空首布钱,近人称之为“古布”,^②这种东西应断为西周之物,因为到了春秋前期,三川、三晋地区就出现了另一式原始空首布钱,这种空首布钱形体较大而有简单铭文。《古泉汇》载有“上”“山”“穴”等铭文者;《古钱大辞典》载有“益”字铭文者;前《河北省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十九期载有“卢氏”铭文者。这种布钱不再是农具而完全是货币。

在我国,金属货币的广泛铸造和使用,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分不开的,过去那种物物交换或使用物品货币,显然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了。因此王室及诸侯国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相继发行了金属铸币。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各侯国铸钱的记载有几条值得注意的史料。

《国语·周语》:“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王弗听,卒铸大钱”,此言周铸钱。

《吕氏春秋·报更》:“赵宣孟……见飢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与钱百”。此言晋钱。

《管子·轻重戊》:“(齐)桓公……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又《管子·轻重甲》有“今君铸钱立币”之语。此言齐铸钱。

《史记·循吏列传》:“(楚)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孙叔敖)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此言楚铸钱。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又《史记·六国表》秦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

这些记载并不完全正确,有些是史者追述之辞,但是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出现和使用,这必然推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春秋前期,就诸侯国来说,如当时的郑国、齐国、卫国、晋国商业和商人的活动与政权的兴衰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因而在黄河中游三川(周)、三晋地区就开始模仿农业生产工具钱或铸的形状来造币,钱铸在商、周之际虽曾被用作交换的媒介物,而空首布的正式铸造和使用还是春秋中期前后的事,《国语》所载“周景王铸大钱”,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二四年)在春秋中期以后,景王所铸之钱,应为仿农具钱或铸形状的空首布钱,所以称之为“钱”,景王铸钱是用膨胀通货手段来剥削人民的财富,同时也意味着与商人之间争夺铸币权的斗争。所以单穆公说:“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且绝

民用以实王府”。我们再从空首布钱所纪地名来观察，也多半是春秋时期周、郑、晋、卫等国的地望，后世出土也在这些国家特别是周王室的范围内，所以说空首布钱是春秋时期的周王室及郑、晋、卫等侯国的金属铸币。

东方的齐国，在春秋前期也摹仿另一种生产工具刀削的形状来铸造货币，叫做“刀币”，按照刀币的铭文来看，应该叫做“刀化（货）”。从目前的资料观察，刀化最原始的一种应该象《续泉汇》所载的大型面素背“十”之刀化，②《管子·轻重戊》所载：“（桓公时）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如果从春秋前期齐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推断，桓公时在国都或重要的城市开始由官方铸造货币是可能的，在桓公以前齐地可能经常以刀削这种工具作交换媒介。“无文刀化”还是没有完全取得货币形态的商品，齐国开始铸造刀化，标志着刀削这种商品已经完全取得货币形态，而且法定化。有铭文的齐国刀化应该是桓公以后的铸币，如“齐之法化”、“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系春秋时期姜齐的铸币。遗存最多的“齐法化”，是战国时期田齐铸造的通行货币，或是官方规定的刀化形制，当然不乏私铸。

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中期前后，可能出现了仿制贝币的铜贝，早期可能无文字。近世谈蚁鼻钱（有文字者）均认为是庄王时孙叔敖为楚相所铸，这种说法还有待地下发掘来证实，不过蚁鼻钱为楚国从春秋末年到战国的主要铜铸货币是不成问题的。

到了战国时，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一天天的加大，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商业城市更多的出现，便促使金属铸币更广泛的流通，同时黄金、白银也被充作币材。原来流通空首布钱的地区，多半演变成为平首，只略具农具钱或铸的形状，并且地区扩大，影响到东北的燕国，也可能影响到西方的秦国。原来在齐国的刀化，也影响到东北的燕国，首先出现“尖首刀”，燕国后来又大量铸造小型“𠂔”字刀化，燕国的刀化又影响到赵国，赵国一部分城市也曾铸造刀化，刀身较直。直刀可能影响到中山国。楚国的蚁鼻钱也流到了陈、蔡、鲁、宋等地。同时黄金在楚国已经铸成块状来使用，印有地名和重量。战国后期，首先在秦国地区出现了取象于璧环或纺轮形状的圜钱（圆钱圆孔）稍后又铸行圆形方孔的钱。随着秦的势力膨胀，圜钱在原来通行布钱地区出现，东方刀化通行地区也受到了圜钱影响，出现了圆形方孔的钱。这样，就形成了我国先秦铜铸币的四大系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革币制，废除刀、布、贝及圜钱，定货币为黄金与铜钱二种，铜钱则专行圆形方孔文为“半两”的钱，至此，我国的铸币在形制上第一次得到了统一。

总之，关于我国货币的起源问题，可以试得出这样一个推论，这个推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考古发掘的证实。

一、我国起码在夏商两代，贝这种重要的外来交换品已经早已完成了它向货币转化的过程而取得了货币形态，这是我国最早的货币之一，在商代后期，又出现了铜铸贝，这是我国金属铸币的滥觞。贝在西周时继续使用并且有所发展，天然贝在商、周以来均以“朋”为单位，而铜铸贝在周代大概以“𠔁”为单位计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有铭